

氐语考*

姜照中 Seda Karataş

[摘要] 对于上古至隋唐时期活跃于中国西部的氐人所使用的语言，学界已有数种研究。目前为止，学者们大都同意将之归入藏缅语族，但究竟属于彝缅语支还是藏语支，尚无定论。本文对汉文古籍中所记载的语义较明确的氐语词进行了收集和考释，并为这些词找到了语音、语义两方面都对应的藏文词。由此发现，氐语其实极接近藏文所反映的古代藏语，是一种古藏语方言。

[关键词] 氐语 氐人 藏语

一 前 言

自上古至隋唐时期，氐人不仅长期活跃于中国西部，更在十六国时期建立过地方政权。虽然今天已不见以“氐”为名的人群，但学界对氐人及其语言仍颇有兴趣。

不少研究者试图将现生活在四川、甘肃接壤处的白马藏族与氐人，尤其是白马氏相联系；其中，尚理、周锡银、冉光荣（1980）、缪钺、杨耀坤（1980）等主要依氐人、白马藏族二者的习俗作为证据。但齐卡佳（2008）认为中国古籍中对氐人等少数民族习俗的描述往往笼统、简略，以至于史书中不少古代民族的习俗都可与白马藏族的习俗进行附会，故尚理等的研究方法并不可取。另一部分研究者则试图从语言方面入手。黄布凡、张明慧（1995）认为，白马藏族原使用的是氐语，之后才改说了藏语；白马话与藏语相异的部分，即白马语的底层便来自氐语。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2007:13、206-208）则指出，黄布凡、张明慧提到的这种接触不应使白马藏族的语言“发生质的飞跃，甚至可以放到藏语的方言系统里面去”；并认为，白马语是“不同于藏语但属于藏语支的一个独立语言”，其“相当数量的早期汉语借词”“与史书上讲的白马氐人‘多知中国语’有关”“由于历史上氐与羌比较接近，推测他们的语言可能也应该如此”，而白马语就有与羌语支语言接近的地方^①。各家观点不同。总之，迄今为止，将氐语、白马语二者相联系的研究尚无有效成果。

也有数种研究主要就文献中以汉字记录下的氐语词对氐语进行考察。就目前所见，大约有三种观点：第一种，氐语属彝缅语支。如黄树先（2003:12-14）主张“氐语确实是现在彝缅语的祖语”；齐卡佳（2008）也认为氐语“有可能也属于彝缅语支”，但“资料太少，很难据此来做语言之间的历史比较和系属问题研究。”第二种，语支不定。杨铭（2014:117）认为

* 感谢匿名审稿专家、编辑老师的宝贵意见。感谢郑子宁、钟小鑫、般灯法师的鼎力支持。

① 对于白马语的归属问题，江荻（2017）通过“语言谱系自动分类”的方法给出了很值得参考的答案，即白马语在藏语支中“居于藏语本体语言与非藏语语言之间”“可看作未进入藏语核心方言的边缘性语言或方言，历史上可能不是藏语。”

“似可以把氐语划入藏缅语族中。具体属于哪一语支，因材料太少，难以判定”“在今天川甘一带的藏语方言中，或许能找到古代氐语的一些痕迹。”第三种，氐语为藏语。多识仁波切（1993）主张氐语词语都可以用藏语解释，即氐语为藏语。

我们的观点和多识仁波切的类似，即氐语与藏文反映的古藏语（下文以“藏文”代称此种古藏语）极接近，为一种古藏语方言。以下，本文逐条考察汉文史籍中记载的来自氐语且语义较为明确的音译词。具体做法是：先将音译词及其相关文献材料依时间先后列出；再据《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2），为音译词给出相应时期的拟音^①；最后根据语音、语义，参考《藏汉大辞典》（张怡荪 1993）、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藏—英词典》）（Das 1902）等，给出氐语原词、对应的藏文词^②，进而解释它们在语音、构词法上的异同；并依情况考察彝缅语支语言或羌语支语言中相应的词，即其同源词或同义的词。以此证明氐语是古藏语方言，不是彝缅语支或羌语支语言。对前人已有研究的氐语词，则会在梳理、检视文献材料之后，首先回顾和讨论前人的观点。

氐人见于文献的时间下限是唐代中期，即 8 世纪（杨铭 2014:98-101）。氐语材料见于文献的时间下限是十六国时期，即 3-4 世纪。藏文的拼写虽经厘定，但 DeLancey（2003）认为它能反映 7 世纪时的藏语语音，瞿靄堂（2016）更认为它能反映 3-4 世纪时的藏语语音。可见，氐语、藏文在时间方面相去不远。故在研究中考察二者是否接近，在学理上是可行的。下文所列藏文词的语音和汉字所记的氐语语音存在些许差距，这也不难理解，且可总结出三种原因：第一，氐语、汉语音系不同，对音难免出现偏差；第二，氐语、藏文语音虽极接近，但也很难全然相同；第三，有些对音中存在的送气与否、清浊差异可能是古藏语的特性导致的，即西田龙雄（2002）所说的“不送气和送气、清声和浊声常常混在一起使用”。

二 语词考释

（一）鸾

《逸周书·王会解》：“成周之会”“氐羌以鸾鸟”（黄怀信等 1995:916）。《说文解字·鸟部》：“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采，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从鸟懿声。周成王时氐羌献鸾鸟。”（许慎 1963:79）

由此可知，氐羌的“鸾”为“神灵之精”。而藏文“灵魂”为 bla^③。藏族有“魂鸟”bla bya（bya 义为“鸟”）观念，认为特定的“鸟”“人”在灵魂层面存在联系（谢继胜 1991；Stein 1972:227）。藏文 bla “灵魂”与氐羌“鸾”（EOC. [*b•ro:n] > LOC. [*rua:n]）音义皆对应。

原始藏缅语“灵魂”为 *m-hla（Matisoff 2003:593）。很多藏缅语的“灵魂”一词都源自于此。如羌语支羌语的 mə la、木雅语的 lə²⁴，彝缅语支阿昌语的 a³¹pzua⁵⁵、巍山彝语的 ha⁵⁵

^① 本文汉语历史音韵的分期及各期拟音依据《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编辑委员会 2012），“前期上古汉语（周代的语音）”“后期上古汉语（战国、汉魏的语音）”“前期中古汉语（南北朝、隋的语音）”在本文中分别简记作 EOC. (Early Old Chinese)、LOC. (Late Old Chinese)、EMC. (Early Middle Chinese)。

^② 本文藏文转写使用威利（Wylie）转写系统。为方便对比氐语、藏语，也用该转写系统为所拟的氐语词注音。必要时，藏文、氐语转写形式加注国际音标。

^③ 邢公畹（揣振宇、李旭练 1998）、吴安其（2016:406）为藏文 bla 提供了其他汉藏语中的同源词，如汉语“魄（EOC. [*phra:g]）”。

(黄布凡 1992:225)。可知藏文 bla 在羌语支、彝缅语支语言中的关系词, 其声母为双唇塞音加流音这种组合的并不多见。如此, 与“鸾”最接近的应是藏文 bla “灵魂”。

但氐语“鸾” **blan^① “神灵之精”比藏文 bla “灵魂”多了一个辅音后缀**-n。藏文中有与之同源的后缀-n, 可加在名词词根后构成新名词, 如 nyi ma “太阳、(一)日”→nyin “白天、(一)日”、blo “主意”→blon “主意; 臣”(张济川 2009:254)。

(二) 犝

《山海经·中山经》:“荆山”“其中多犝牛, 多豹虎”(袁珂 1980:151)。司马相如《子虚赋》:“兽则庸犧牦犝, 沈牛麋麋”(司马迁 1981:3025)。扬雄《校猎赋》:“犧苍豨, 跋犀犝, 獾浮麋”(班固 1986:3547)。《说文》:“犝, 西南夷长髦牛也。从牛犝声。”(许慎 1963:30)

据以上材料, 可知出自“西南夷”的“犝”就是“牦牛”。又《史记·西南夷列传》(司马迁 1981:2991)指出“西南夷”中多“氐类”, 则“犝”很可能音译自氐语。藏文'bri “母牦牛”可与以汉字记音的氐语词“犝(EOC.[*ruu]>LOC.[*ruu])”**ri 对应。但藏文词的基字为b, 声母为'br, 氐语词的声母却为**r。该现象应反映了氐语复辅音声母的单化方式; 或也同此词在更早时期的词根有关, 因为藏文的基字“不一定是原本的共同词根”(郑张尚芳 2017)。

牦牛在当时氐人生活的地域中应是常见动物, 相应的词不太会从别的语言借用。且很多藏缅语并不像藏语这样一个义为“母牦牛”的词根, 而是用来自原始藏缅语“野水牛、野牦牛”*broŋ (Matisoff 2003:585) 的词根加上表“雌性”的后缀来构成义为“母牦牛”的词, 如羌语支史兴语的 bo³³mi⁵³、纳木兹语的 bu⁵⁵mi⁵³ (黄布凡 1992:86); 黄布凡(2009)在彝缅语支的水田话中也发现其“母牦牛”为 bə⁵³⁻⁵⁵mie⁵⁵。

(三) 纓

《说文》:“紓, 氐人殊缕布也。从糸并声。”(许慎 1963:277)黄树先(2003:13-14)主张, “紓”义为“布”, “现代彝缅语还在沿用这个词”, 如浪速语 pəŋ³⁵、载瓦语 pan⁵⁵、彝语 pho³³~pho²¹等。齐卡佳(2008)也认为, “紓”与下文中的“紩”“大概指的是同样的一个词”, 可拟为[*peng], 义为“布”, 在彝缅语支语言中可见其对应词, 如南华彝语 phio³¹、仰光缅语 peŋ⁴⁴、载瓦语 pan⁵⁵、浪速语 pəŋ³⁵等。杨铭(2014:117)说:“紓, 上古音作*preng, 紩作*p‘jier。今羌语衣服作p‘u; 藏语套服作pu? (德格方言)。”多识仁波切(1993)则主张“‘紓’是 Bang dan (围裙)”, 出自藏语。藏文为 pang gdan。

相较于杨铭(2014)、多识仁波切(1993)的见解, 黄树先(2003)、齐卡佳(2008)为“紓”在彝缅语中找的“原词”不仅语音与“紓”类似, 在语义方面也与“殊缕布”接近。但在藏语中我们能找到语音、语义更符合氐语“紓”“真实面目”的对应词。“紓”是“殊缕布”, 《说文》:“缕, 线也”(许慎 1963:275), 则“紓”的特点在其纺织用线的方式。氐语“紓(LOC.[*preŋ])”可拟为**preng, 其语义应与“线、绳子”有关, 与藏文 phreng “行、串”对应, 如 phreng ba “珠串、鬘(花串)”、phreng thag “绳子、鬘”、ske phreng “项链”。

氐语 **preng “绳子”的关系词可见于数种羌语支语言, 如兰坪普米语 bzə¹³、嘉戎语 bre (黄布凡 1992:207)。它们在汉语中的同源词是“绷(EOC. [*prwŋ])”, 在彝缅语支语言中则尚未见到其同源词或借词。

^① 标**者为本文作者所拟。

(四) 织

《说文》：“紩，氐人纁也。读若《禹贡》玼珠。从糸比声。”（许慎 1963:277）上文已提到齐卡佳（2008）认为“紩”“絣”是同一个词，读音为 [*peng]，义为“布”。而黄树先（2003:14）则认为与“紩”相对的是义为“布”的书面缅语 pit⁴。

但就“紩”字的语音而言，既然“读若《禹贡》玼珠”，今《尚书·禹贡》将“玼珠”写作“蠮珠”（阮元 1965b:82），则“紩”音“蠮（LOC. [*bi:n]）”。如此，黄树先（2003）的观点难以成立。就词义而言，“紩，氐人纁也”（许慎 1963:277），《说文》：“纁，西湖毳布也”（许慎 1963:277），则“紩”就是“毳布”。可知“紩”并不是一般的“布”，而是用毛织的布，或者说“毛毡”。如此，齐卡佳（2008）的观点也难成立。氐人将“毛毡”称作“紩”**bying。而藏文中将“毛毡”称作 phying ba，phying 与 **bying 音义皆可对应。

氐语 **bying “毛毡、毡子”的关系词可见于个别羌语支语言，如木雅语 phə⁵³（黄布凡 1992:163）；但在彝缅语支语言中则尚未见到其同源词或借词。

(五) 仇池

“仇池”为山名，山在今甘肃陇南，曾为氐人聚居地。据《史记·西南夷列传》《汉书·西南夷传》，西汉时，白马氐一直“在蜀之西”（司马迁 1981:2991；班固 1986:3837）。《后汉书·白马氐传》则载，白马氐“居于河池，一名仇池”（范晔 1981:2859）。东晋常璩《华阳国志·汉中志》称该山“瞿堆”（任乃强 1987:96）。《太平寰宇记·山南西道》“河池县”条引南朝[宋]郭仲产《秦川记》：“仇池山本名仇堆^①山”（乐史 2000:237）。北魏郦道元《水经注·漾水》称“瞿堆”“山上丰水泉，所谓清泉涌沸，润气上流者也。”（杨守敬、熊会贞 1989:1695）据上可知，仇池山以多泉水为特点，且除“仇池”外，其地名又记作“河池”“瞿堆”“仇堆”。

氐人何时入居仇池山，史有明文。《宋书·略阳清水氏杨氏传》载：“略阳清水氏杨氏，秦、汉以来，世居陇右，为豪族。汉献帝建安中，有杨腾者，为部落大帅。腾子驹，勇健多计略，始徙仇池”（沈约 1980:2403）。《周书·氐传》：“汉末，有氐帅杨驹，始据仇池百顷，最为强族。”（令狐德棻 1980:894）唐张守节《史记正义》引唐李泰《括地志》：“陇右成州、武州皆白马氐，其豪族杨氏居成州仇池山上。”（司马迁 1981:2991）如此，可知南北朝时期的“清水氐”、汉代的“白马氐”其实是同一人群，在其首领杨氏的带领下，于东汉建安年间迁居仇池山。且在此以前，当地并不称“仇池”。

据《后汉书》中所说，杨铭（2014:117）认为：“河、仇对举，可见仇即河或水之意。仇，上古音作 zəu，今羌语河、水皆作 tsuə（桃坪方言），藏语水作 tə‘ə（甘孜方言），白马藏语（引注：藏族白马语）水作 tʃo”“可见，仇池之‘仇’就是藏语支中河或水字的译音。”

杨铭的思路无疑是正确的，但其论证仍可修。首先应摆脱简体字带来的误解，杨铭为“仇”字给出的拟音其实属于“雠”字。而“雠”“仇”二字不同音，“雠”为 LOC. [*dju] > EMC. [*dziu]， “仇”为 LOC. [*gu] > EMC. [*giu]。“仇池”“瞿堆”“仇堆”的拟音分别为 LOC. [*gu duaj] > EMC. [*giu dje]、LOC. [*gʷtua tu:j] > EMC. [*gio tuai]、LOC. [*gu tu:j] > EMC. [*giu tuai]， 可见三者音近，且所指为同一山体，则三者是对同一氐语词的音译；其区别在于，无论文献证据还是拟音，都显示“仇池”为后期上古汉语记音，“瞿堆”“仇堆”为前期中古汉语记音。

^① 《太平寰宇记》原本误作“仇维”。“维”字形似“堆”字，且“仇池”“瞿堆”为同音异写。故本文改正为“仇堆”。

“仇”,即氐语 **gyu,对应于藏文 chu“水”。“水”,在与藏语关系极密切的藏语支(Bodish) TGTM (Tamang-Gurung-Thakali-Manang) 语组 (Mazaudon 2003) 的 Tamang (Taglung) 语为²kju、Gurung (Ghachok) 语为²kju、Manang (Ngawal) 语为²kjy, 原始 TGTM 语为 *^Bkjui (Mazaudon 1978; Mazaudon 1994:27); 在藏语支 Bumthang 语组的 Kurtöp 语为 khwe、Bumthap (Choekhor) 语为 khwe、Bumthap (Chume) 语为 khwe。这些词都来自原始藏缅语“水” *ti(y) (Michailovsky & Mazaudon 1994)。

TGTM 语组的 kj-、Bumthang 语组的 kh(w)-、氐语的 **gy-, 对应于藏文“水”的声母 ch-。原始 TGTM 语部分词的 *kj- 与藏文舌面音、原始藏缅语舌尖音可构成对应, 见表 1:

表 1 TGTM 语组 kj-与藏文舌面音、原始藏缅语舌尖音的对应^①

语义	藏语支			彝缅语支	羌语支	原始藏缅语
	Tamang (Risiangku)	原始 TGTM 语	藏文			
水	² kjui	* ^B kjui	chu (ch<*thy)	—	t _A ¹³	*ti(y)
断	¹ kjut	* ^A kjut	gcod (c<*tsy)	shas ⁴ (节)	—	*tsyat
甜	—	* ^A kji	zhim (zh<*zy)	—	—	*dz(y)im
犁	—	* ^B gio	gshol (sh<*sy)	—	—	—

从构词角度分析, 氐语 **gyu 中的 **g- 可能来自一个加在名词词根前的构词前缀。该前缀在原始藏缅语里已出现 (Matisoff 2003:134-135); 在藏文里, g- 虽多见于表动物的名词中, 如 gzig “豹”、glag “雕” (向柏霖 2008:52-55; Jacques 2014; Hill 2019:24), 但也可见于其他范畴的、有异体形式的名词 (语素) 中, 如 gnam ~ nam “天” (gnam mkha' ~ nam mkha' “天空”)、gzer ~ zer “光线” ('od gzer ~ 'od zer “光线”)、gseng ~ seng “间隙” (gung gseng ~ gung seng “假期”) (张济川 2009:79、81、104、173、251)。氐语的 **gy-、TGTM 语组的 kj-、Bumthang 语组的 kh(w)- 都显示了这个构词前缀的痕迹, 声母形式可能是此构词前缀参与了原声母演变的结果。

Michailovsky & Mazaudon (1994) 指出, 在硬腭塞擦音之后, 藏文-u 对应于 Bumthang、Dakpa 等藏缅语言的前元音。Matisoff (2003:192) 同意 Michailovsky & Mazaudon 的观点, 认为原始藏缅语部分词中的*-ay、*-i(y) 韵母^②在藏文中会变为-u, 在其他藏缅语中则多会变为前元音。TGTM 语组-u、藏文-u 与原始藏缅语 *-ay、*-i(y) 的对应, 如表 2 所示:

表 2 TGTM 语组-u、藏文-u 与原始藏缅语 *-ay、*-i(y) 的对应^③

语义	藏语支			彝缅语支		羌语支	原始藏缅语
	Kurtöp 语	原始 TGTM 语	藏文	仙岛语	拉祜语		
水	khwe	* ^B kjui	chu	t ⁵⁵	ti ⁵⁴ (浸)	tʃ ⁵⁵	*ti(y)
十	che	* ^B tsjui	bcu	tshi ⁵⁵	tehi ³³	sə ⁵⁵	*ts(y)i(y) ✕ *tsyay

^① 材料来自 Mazaudon (1978, 1994:56、59、63、171)、黄布凡 (1992:16、290)、Michailovsky & Mazaudon (1994:551)、Matisoff (2003:589、616-617)。丰琨、施向东 (2012)、龚煌城 (1977) 都认为, 藏文 y 会造成其前舌尖音的腭化。故此处标明之。

^② 原始藏缅语 *-ay、*-i(y) 有相互转化的现象 (Matisoff 2003:215-219)。

^③ 材料来自 Mazaudon (1978)、黄布凡 (1992:16、269、482)、Michailovsky & Mazaudon (1994:550-551)、Matisoff (2003:616、618)。

表2显示，原始藏缅语 *-ay、*-i(y)，TGTM语组、藏文的反映形式都是-u，而在藏语支Bumthang语组Kurtöp语以及彝缅语支语言的反映形式是前元音；可见，-u很可能是藏文和藏语支TGMG语组的共同创新。

“仇池”一词中的**gyu应能显示氐语和藏文的接近，原因有三：第一，“水”是各语言的核心词，一般不会借自别的语言，而且氐语**gyu与藏语支TGTM语组的“水”也相合；第二，氐语**gyu韵母发生了少见于其他语言、但可同时见于藏语支语言的合乎规则的语音变化；第三，氐语**gyu的构词法在藏缅语以及藏语都可得到合理解释。

“池/堆”对应的是藏文mda’“箭、河谷口”；则“仇池”**gyu da’应对至今仍在使用的偏正式复合词chu mda’，其中两个名词语素，前者为修饰成分，后者为中心成分。chu mda’“水柱；水汇合处”，与《水经注》所记仇池山上“清泉涌沸、润气上流”的风景相合。

杨氏带领的氐人于汉末始徙仇池山，在他们迁入之前，当地并无“仇池”之名，据此可知地名“仇池”来自氐语。而“仇池”**gyu da’一词，不仅其语素都见于藏语，还合乎藏语的构词法，更与藏文chu mda’相对应。

(六) 豪

氐人的首领多用“豪”这一称号。如《后汉书·白马氐传》：“氐人大豪齐钟留为种类所敬信，威服诸豪”（范晔 1981:2859-2860）。郑张尚芳（2009）认为，汉时羌酋的称号“豪”可对应藏文'go“首领、头人”，而该词即夏人对其首领的称呼“后(EOC. [*go:?] > LOC. [*go:?])”。

暂不论古羌人的语言为何，氐人的“豪”(LOC.[*gau])确应对藏文'go pa。在该氐语派生名词的氐—汉对音中，古人以“豪”的韵尾*-u，记录与藏文-pa相对的后缀，*-u与-pa的不一致，也可从藏语的历时演变得到解释。张济川（1994）指出：①藏文后缀ba、bo来自pa、po，其条件是后缀前词根的韵尾为-Ø、-ng、-r、-l；②作名词后缀、且词根无韵尾时，指人名词的pa不变，po多变为bo；非指人名词的pa多变为ba，po多变为bo；③在藏语口语中，名词后缀ba的声母在12世纪时已有读作w者。且此类音变在藏语支中其实常见（孙宏开 2004），如后缀ba、bo在藏语拉萨话弱化成了wa、wo（张济川 1994），而藏文b在安多方言中也成了w（王双成 2012:115；格桑居冕、格桑央京 2002:277）。如此，则“豪”的*-u，应为后缀**ba的弱化形式**wa。只是不同于藏文，在氐语中，后缀**pa不论是否用于“指人”名词，都已弱化成了**wa。因此，氐语“豪”可拟为**go wa。

夏人有“后”这一称号，楚人则有称号“囂”，又写作“敖”（罗运环 2010），“囂/敖(EOC. [*ŋa:w] > LOC. [*ŋau])”应也与藏文'go pa对应。张永言（1988）主张楚人的语言与藏缅语族有关，颇有道理。一个有名的例子来自楚公族子文。是人为斗伯比之子，幼时见养于虎，《左传》：“楚人谓乳穀^①，谓虎於菟。故命之曰斗穀於菟。”（阮元 1965a:370）和三等字“乳（EOC. [*ŋjo?] > LOC. [*ŋjø?])”相比，“穀（EOC. [*no:] > LOC. [*no:?]）”更接近藏文nu。《汉书》作者班氏，为子文之后，《汉书·叙传》将“於菟（EOC. [*qa: da:] > LOC. [*?a: da:]）”写作“於擇（LOC. [*?a: dra:g]）”（班固 1986:4197），如此更见该词与藏文stag相似。

(七) 益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松之注引鱼豢《魏略·西戎传》：“氐人”“其自相号曰益稚”（陈寿 1980:858）。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了这条史料，并作出了相应的解释。杨铭（2014:116-117）

^① 张永言（1988）指出，诸书中“穀”字常误作“穀”。故改正之。

认为，“盍稚”是氐人称呼别的氐人时所用的说法，“以苻坚的氐人身份称氐豪樊世为‘老氐’，正符合氐人‘自相号曰盍稚’之例子”“稚就是氐，而盍可以对老”，更进一步认为“老”为氐语“盍”的意译，“藏语 $g\epsilon$ 为‘老’： $g\epsilon po$ 作‘老人’（德格方言）。而盍之古音 *gap 与藏语 $g\epsilon$ 是相近的。”齐卡佳（2008）则认为：氐人“自称‘盍稚’”，汉人称氐人为“氐”，“稚”“氐”为同一个氐语词的不同音译。

杨铭对“其自相号曰盍稚”的理解是对的，这句话并非意为“自称‘盍稚’”，而是意为“他们自己以‘盍稚’相互称呼”。如此判断是依据裴注所引鱼豢作品中“自相”一语的其他用例：其一，《三国志·张燕传》裴注：“典略曰：黑山、黄巾诸帅，本非冠盖，自相号字，谓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谓轻捷者为张飞燕，谓声大者为张雷公”（陈寿 1980:261）；其二，《三国志·杜畿传》裴注：“魏略曰：初（杜）畿在郡，被书录寡妇。是时他郡或有已自相配嫁，依书皆录夺，啼哭道路。”（陈寿 1980:497）由这两条可看出“自相”即“（他们）自己相互”。

齐卡佳（2008）在研究“盍稚”这一对音时指出，“盍”字的反切，在《广韵》中为“胡腊切”，在《集韵》中又有“丘葛切”。据此，则“盍稚”的拟音可为 LOC. [*ga:b dujh] > EMC. [*hap d̥ir^h] 或 LOC. [*kha:d dujh] > EMC. [*khat d̥ir^h]。结合杨铭（2014）的观点，可知藏文名词“老人”中的语素 rgad “老”与“丘葛切”的“盍”音义皆合。

藏文名词 rgad pa 由动词 rga ba “变老”加后缀构成，它与 rgan pa “老人、长老”为同义词。和 rgad pa 类似，部分羌语支语言的“老人”中也可见来自原始藏缅语 *r-ga“古”（Matisoff 2003:589）的构词成分，如羌语 qa pa、贵琼语 $ge^{33}pu^{55}$ 。彝缅语支的语言较少用来自 *r-ga 的词，可见的有基诺语 $a^{44}phi^{44}jo^{42}kha^{42}$ “老妇（妇-老）”（黄布凡 1992:57-58）。和以上羌语支、彝缅语支语言的“老”相比，氐语“盍” **khad 多了一个舌尖塞音韵尾，如此，却很合藏文 rgad。且“老”是核心词，在此又出自氐人自称，应非借用。则“盍”颇能反映氐语、藏文二者语音、语法的相似。

（八）衽露

《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中又引《西戎传》称：“氐人”“其妇人嫁时著衽露，其缘饰之制有似羌，衽露有似中国袍。”（陈寿 1980:858）多识仁波切（1993）认为，“‘衽露’是 Rang la（长袍）”，出自藏语。

多识仁波切（1993）在方向上给了我们启示。氐人妇女穿着的“衽露（LOC. [*njum? ra:h] > EMC. [*n̥ium luo^h]）”，应对藏文 snam phrug “羊毛面料”。该词属于并列式复合词中的“同义复合”类型，由两个意义相近的名词语素组成。名词语素 snam 义为“羊毛面料”；名词语素 phrug 即后来音译为“氆氇”者，也义为“羊毛面料”，与动词 ’phrug pa “抓挠、刷”^①有关。

根据汉字记音，即氐一汉对音，氐语“衽露”应拟为 **nam rug，即与藏文 snam phrug 第二个音节的基字 ph 对应的辅音脱落了。氐语第一个音节中的复辅音声母亦当已简化，否则对音中应会有所体现。可参“唐蕃会盟碑”藏汉对音中的例子，如 snam 对音为“悉南（EMC. [*siit nám]）”，上加字 s，使用“悉”来体现（罗常培 2012:224-225；李方桂、柯蔚南 2006:40-43）。

（九）蒲

《晋书·苻洪载记》载：日后建立前秦的苻氏是略阳临渭氐人，“世为西戎酋长。始其家池中蒲生，长五丈，五节如竹形，时咸谓之蒲家，因以为氏焉。”至东晋永和年间，蒲洪“以

^① 周凤兰（2005）指出，“氆氇”这种面料在制作前要将羊毛刷刮松软。

谶文有‘艸付应王’，又其孙坚背有‘艸付’字，遂改姓苻氏。”（房玄龄 1980:2867-2868）

我们认为，以上因植物“蒲”而得氏的说法应是曲解，原因有二：其一，据《三国志·乌丸鲜卑东夷传》裴注引《西戎传》可知，氐人“多知中国语，由与中国错居故也。其自还种落间，则自氐语。”（陈寿 1980:858）则身在氐人聚居地，又世为酋长者不大可能以汉语词“蒲”为氏；其二，“蒲（LOC. [*ba:] > EMC. [*buo]）”“苻（EMC. [*bio/buo]）”音近，则二字都是对同一氐语词的音译，与汉语“蒲”的词义无关。再看该得氏故事，其中植物“长五丈”，必非蒲；说“如竹形”，便应是竹。如此，可知氐语“蒲/苻”与藏文 spa “竹”对应。

藏文 spa 来自原始藏缅语 *g-pwa ✕ *r-pwa “竹”（Matisoff 2003:62-63、608）。在羌语支语言中，其关系词的音节结构尚有与 spa 类似者，如羌语 spu “竹”（黄布凡 1992:130）；但在彝缅语支语言中，自原始彝缅语 *wa² “竹”以 *w 为声母后（Matisoff 2003:62-63、608），其同源词的音节结构便与 spa 差异较大，如书面缅语 wa³、拉祜语 va⁵³（黄布凡 1992:130）。

（十）诏

除了“豪”以外，氐人还有一更高级的称号“诏”。苻坚在位时便被称作“苻诏”。故《宋书·五行志》载：民间有“河水清复清，苻诏死新城”的谣语（沈约 1980:920）。或是因前秦的煊赫，氐语称号“诏”传入了东晋。《晋书·桓玄传》（房玄龄 1980:2599-2600）：

玄左右称玄为“桓诏”，桓胤谏曰：“诏者，施于辞令，不以为称谓也。汉魏之主皆无此言，唯闻北虏以苻坚为‘苻诏’耳。愿陛下稽古帝则，令万世可法。”玄曰：“此事已行，今宣敕罢之，更为不祥。必其宜革，可待事平也。”

此种“用夷变夏”的行为正显示了氐人的影响力。而据《旧唐书·南诏蛮传》知，日后的南诏也“谓王为‘诏’”（刘昫 1981:5280）。故岑仲勉（1957:282）认为，“南诏”之“诏”“本氐羌语，故苻坚称作苻诏，相当于西藏语之 Rgyapo。”即藏文 rgyal po。

岑仲勉（1957）的思路方向正确，但所选对应词有问题，rgyal 的基字是软腭音，韵母主元音也太侈。与“诏（EMC. [*teieu^b]）” **ce wo 对应的应是藏文派生名词 rje bo “首领”，二者音义皆合。Jacques (2004)、Hill (2013) 通过将藏文的 rje 与 Tamang 语的 ⁴kle 对比，发现 rje 应来自 *rl^ye。后缀 -bo 的来源、演变见前文；在氐语中，它已弱化成了 **-wo。故“诏”的韵尾 *-u 可与之对应。

至于南诏的“诏”则不必借自与藏文接近的氐语，却更可能与原始彝缅语“统治者” *m-dzəw²、彝语纳苏话 dz¹³³mo³³、拉祜语拉祜纳话 jo⁵⁴mo⁵⁴（Matisoff 2003:123、588）有关。

（十一）仇绥

另有一则对音也与苻坚有关。《资治通鉴·晋纪》（司马光 1956:3296-3297）：前秦建元十六年（380），苻坚使苻丕等宗亲将诸氐“如古诸侯”一般镇守各处。

坚送丕至灞上，诸氐别其父兄，皆恸哭，哀感路人。赵整因侍宴，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博劳舅父是仇绥，尾长翼短不能飞。远徙种人留鲜卑，一旦缓急当语谁！”坚笑而不纳。

胡三省《通鉴》注说，“博劳”即伯劳，“仇绥，不知为何物。”（司马光 1956:3297）据文义可知，赵整是在将“远徙种人留鲜卑”的君主苻坚比作“尾长翼短不能飞”的“博劳舅

父”^①“仇绥”。“博劳”是鸟名，则“仇绥”也应是鸟名。

我们认为“仇绥”即杜鹃鸟，原因有二。其一，在佛教传入之前，古代藏族社会中流行苯教，而苯教崇拜杜鹃鸟。故藏族社会至今认为“杜鹃鸟是百鸟之王”，每年三月仍有“迎鸟节”（白玉芬 2007:22-23）。且杜鹃鸟常与苯教传说中的重要人物关联（霍夫曼 1986；夏察·扎西坚参 1989）。而重视舅权的尔苏藏族（陆刚、李平凡 2016）不仅“认为杜鹃是神鸟，是祖先”（四川省甘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571），还将杜鹃鸟与舅父联系起来，在他们的民歌、谚语中便有：“人中母舅最大，鸟中杜鹃最大”；“会打架就不打舅舅，会打鸟就不打杜鹃”^②（李星星 2008）。如此，与氐人苻坚被比作“博劳舅父”“仇绥”的说法相合。其二，藏文 kug rtse “杜鹃鸟”，其发音可与“仇绥 (EMC.[*giu siui])”所记氐语词 **gu tse 相对应。

与藏文 kug 同义的词多是类似的拟声词，如汉语“布谷（鸟）”，在彝缅语支、羌语支的语言中也很常见，如彝缅语支拉祜语的 qu³⁵pu³³、南华彝语的 ku⁵⁵pu³³、仙岛语的 kuk⁵⁵tun⁵⁵、载瓦语的 puk⁵⁵tun²¹，羌语支木雅语的 kə⁵⁵ku³³、九龙普米语的 ku¹¹pu⁵⁵（黄布凡 1992:115）。但派生词“仇绥”中可见与藏文 rtse 相对应的氐语词缀。劳费尔（2013:211）指出，虽然藏语词汇中的 tse、tsi 等音常用来记录汉语词中的“子”，但 kug rtse 中的 rtse 是“一个真正的藏文词缀”。

三 结 论

上文中，我们对收集到的 11 个氐语词逐一进行了讨论，其汉字记音、拟音及对应的氐语、藏文形式详见表 3。

表 3 氐语词汉字记音、拟音及对应的氐语、藏文形式^③

记音词	上古及前期中古汉语拟音			氐语	藏文
	EOC.	LOC.	EMC.		
鸾	[*b•rom]	[*rua:n]	—	**blan [**blan]	bla [bla]
鞚	[*rui]	[*rui]	—	**ri [**ri]	'bri [mbri]
絢	—	[*preŋ]	—	**preng [**preŋ]	phreng [phren]
纰	—	[*bi:n]	—	**bying [**bjin]	phying [phjin]
仇池	—	仇池[*gu duaj]	仇堆[*giu tuai] 瞿堆[*gio tuai]	**gyu da' [**gju day]	chu mda' [tchu mda]
豪	—	[*ga:u]	—	**go wa [**go wa]	'go pa [ŋgo pa]
盍	—	[*kha:d]	[*khat]	**khad [**khad]	rgad [rgad]
衽露	—	[*njuum? rah]	[*nim luob]	**nam rug [**nam rug]	snam phrug [snam phrug]

^① 今本《晋书·苻坚载记》等作“博劳旧父”（房玄龄 1980:2928），但“旧父”不文，且《太平御览·羽族部》引《晋书》亦作“博劳舅父”（李昉等 1975:4230），则知应为“博劳舅父”。

^② 又说“不会打鸟打包谷雀（布谷鸟），不会打人打娘舅”（杨光甸 2008）。

^③ 藏文字母“ঁ (')若作前加字，为鼻冠音；若作后加字，在古藏语中表示的音值为[*y]，在藏文中则标示了音节结构。相关研究，详见 Hill (2005, 2009, 2019:5-7)、Jacques (2012)。

蒲	—	蒲[*ba:]	蒲[*buo] 苻[*bio/buo]	**ba [**ba]	spa [spa]
诏	—	—	[*teieu ^b]	**ce wo [**tee wo]	rje bo [rdze bo]
仇绥	—	—	[*giu siui]	**gu tse [**gu tse]	kug rtse [kug rtse]

将氐语和藏文有对应的词进行比较,可以看出两者在词语结构及构词方面存在四种差异:
①氐语词使用了构词词缀,而藏文词中无。如氐语词 **blan(鸾)“鸾鸟,神灵之精”带有后缀 **-n,、**gyu(仇)“水”也显示可能曾带有前缀 **g-,但均不见于对应的藏文词 bla“灵魂”、chu“水”。②氐语词、藏文词的声母不同。如氐语词 **ri(犛)“(母)牦牛”、**gyu(仇)“水”、**rug(露)“羊毛面料”的声母分别为 **r-、**gy-、**r-,而所对应的藏文 bri“母牦牛”、chu“水”、phrug“羊毛面料”的声母分别为 'br-、ch-、phr-。③氐语后缀发生了语音弱化,而藏文后缀没有弱化。如 **go wa(豪)“首领”、**ce wo(诏)“王、统治者”中的后缀分别弱化成了 **wa、**wo,而藏文 'go pa“首领、头人”、rje bo“首领”的后缀仍为 pa、bo,并未弱化。④氐语词显示了复辅音声母简化以及词尾辅音消失的倾向,而此类音在藏文中依然保持着。如藏文词或语素 mda'“箭,河谷口”、'go pa“首领、头人”、rgad“老人”、snam“羊毛面料”、spa“竹”、rje bo“首领”、rtse等中的前加字、上加字在氐语的汉字记音“池/堆”“豪”“盍”“衽”“蒲/苻”“诏”“绥”中都没有反映,应该都已见于氐语^①;又如藏文 kug rtse“杜鹃鸟”,若其确为氐语的对应词,则其词根 kug 中的辅音韵尾 -g 在氐语的词根 **gu(仇)中,应该已经失落^②。

尽管存在以上差异,氐语仍是一种极接近藏文的古藏语方言,原因主要有三:其一,氐语词汇中的语素(词根、词缀)、构词法,乃至那些语词,都与藏文的相合;氐语词、藏文词间的差异也可在藏语构词法、语音演变规律的范围内得到解释。其二,氐语词“仇池/瞿堆/仇堆”“盍”“蒲/苻”是借词的可能性甚微:“仇”“盍”分别义为“水”“老”,都是核心词;“盍”用于氐人相互称呼,“仇池”“蒲”由氐人得名。其三,五个合成词,即两个复合名词(偏正式的“仇池”,对应于藏文词 chu mda';并列式的“衽露”,对应于 snam phrug)以及三个派生名词(“豪”对应于 'go pa,“诏”对应于 rje bo,“仇绥”对应于 kug rtse),所对应的藏文词均可见于藏文词典以及藏文文本,这也足以展示氐语与藏文的接近。如此,我们认为,氐语是一种古藏语方言,极接近藏文所反映的古藏语,但也显示出一些不同于藏文的语言特点。

本研究证明了氐语其实是一种古藏语方言,且能为源远流长的汉藏关系史上加上更多注脚,甚至可为藏语研究提供一些较早的材料。学者们素来知道,发源于今西藏山南地区的吐蕃王

^① 若氐语中存在这些前加字、上加字 m、g、r、s 等,则在氏—汉对音中应会有所体现。试比较“唐蕃会盟碑”中所见的藏汉对音 lha mthong“贪通(EMC. [*thʌm thuŋ])”的辅音韵尾 -m、'gyen“研(EMC. [*jen])”的声母 ɲ-、rje“儿(EMC. [*nɛjɛ])”所反映的上加字 r、snam“悉南(EMC. [*siit nʌm])”所反映的上加字 s(罗常培 2012:224-225; 李方桂、柯蔚南 2006:40-43)。另可参见前文对“衽露”对音的讨论。

^② 若该氏语音节仍保留这个辅音韵尾,则与之对音的汉字应有辅音韵尾 *-k,正如“唐蕃会盟碑”中所见的汉藏对音 chog“属(EOC. [*teiok])”、stag“悉诺(EOC. [*sirt nak])”中的塞音韵尾 -k(罗常培 2012:224; 李方桂、柯蔚南 2006:42)。当然,也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氐语 **gu tse(仇绥)“杜鹃鸟”的词根对应的是藏文同义词 khu byug 的第一个音节,本来就无辅音韵尾;类似的还有藏文表示“杜鹃啼叫声”的拟声词 ku hu 也不带塞音韵尾。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氐语 **gu 当未发生辅音韵尾的演变。

朝对藏语的传播影响颇深 (Takeuchi 2013)。而在本文中, 我们则能看到, 历史上长期活动于今陕、甘、川交界地方的氐人 (马长寿 1984:32-44), 他们的语言也是早期的藏语。更有氐人苻氏建立的前秦, 其最盛时, 疆域东至辽东、山东, 西至西域。在吐蕃王朝兴起以前, 古藏语的分布范围也曾非常广大。

通过此项研究, 我们也看到, 对来自其他语言的语词来说, 古人的记音值得认真对待, 他们提供的释义也往往正确无误。正如麦耘、朱晓农 (2012) 所说: “今天的常识解释不了的东西, 不要用来解释历史。古人和外国人跟我们一样聪明一样笨, 一样富于常识, 并凭常识行事。”氐语的确实存在展现了汉文献的编纂者在记录、分辨其他语言时的可靠性。而此种可靠性将为日后继续依据古代汉语材料研究其他语言、族群提供支持。

另外, 本研究并未发现能支持白马语来自氐语这一观点的材料, 却见到了二者存在两种较明显的区别: 第一, “水”, 氐语形式为显示前缀**g- 痕迹的**gyu, 白马语则为 tʃho¹³; 第二, 氐语中未见藏文前加字的痕迹, 但在白马语中却可见从前加字 m-, 演变来的前置鼻冠音, 如藏文 mda'、'go 中的前加字 m-, 不见于氐语 **da'、**go, 却仍见于白马语 nda⁵³“箭”、ŋge⁵³“首领” (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 2007:193、226、256、286)。

本文观点, 仅一家之说, 意在抛砖引玉, 期待方家指正。

参考文献

- [1] 白玉芬. 2007. 《藏族风俗文化》,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 [2] 班 固. 1986. 《汉书》, 台北: 鼎文书局.
- [3] 岑仲勉. 1957. 《隋唐史》,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 [4] 陈 寿. 1980. 《三国志》, 台北: 鼎文书局.
- [5] 揣振宇、李旭炼. 1998. 《邢公畹先生访谈录》, 载于宝林、华祖根主编《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6~1997)》第 449-461 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6] 多识仁波切. 1993. 《藏汉民族历史亲缘关系探源(一)》, 《西北民族学院学报》第 2 期.
- [7] 范 晔. 1981. 《后汉书》, 台北: 鼎文书局.
- [8] 房玄龄. 1980. 《晋书》, 台北: 鼎文书局.
- [9] 丰 琦、施向东. 2012. 《从藏文词族材料看藏文 c 组声母的来源》, 载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南开语言学刊》(总第 19 期) 第 50-55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0] 格桑居冕、格桑央吉. 2002. 《藏语方言概论》,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11] 龚煌城. 1977. 《古藏文的 y 及其相关问题》, 《中研院史语所集刊》第 48 本第 2 分册.
- [12] 《汉字形音义演变大字典》编辑委员会编纂. 2012. 《汉字字音演变大字典》,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 [13] 黄布凡主编. 1992. 《藏缅语族语言词汇》, 北京: 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
- [14] 黄布凡. 2009. 《木里水田话研究》, 载戴庆厦主编《汉藏语学报》(第 3 期) 第 30-55 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15] 黄布凡、张明慧. 1995. 《白马话支属问题研究》, 《中国藏学》第 2 期.
- [16] 黄怀信、张懋鎞、田旭东. 1995. 《〈逸周书〉汇校集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17] 黄树先. 2003. 《汉缅语比较研究》,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 [18] 霍夫曼. 1986. 《西藏的本教》, 李冀诚译注, 《西藏研究》第 3 期.
- [19] 江 荻. 2017. 《藏缅语谱系的自动分类实验》, 载《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编委会编《中国民族语言学报》

- (第1辑) 第62-105页,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0] 劳费尔, 波塞尔德. 2013.《藏语中的借词》, 载苏发祥、洛赛编译《藏族与周边民族文化交流研究》第111-249页,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 [21] 李方桂、柯蔚南. 2006.《古代西藏碑文研究》, 王启龙译,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 [22] 李昉等编. 1975.《太平御览》(影印宋蜀刊本), 台北: 台湾商务印书馆.
- [23] 李星星. 2008.《南方丝路与尔苏藏族先民》,《中华文化论坛》第A2期.
- [24] 令狐德棻. 1980.《周书》, 台北: 鼎文书局.
- [25] 刘昫. 1981.《旧唐书》, 台北: 鼎文书局.
- [26] 陆刚、李平凡. 2016.《略论凉山尔苏藏族与彝族民俗文化的交融》, 载袁晓文主编《西南民族与南方丝绸之路》第201-215页,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27] 罗常培. 2012.《唐五代西北方音》(重排本),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8] 罗运环. 2010.《楚国谥法研究》, 载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编《纪念徐中舒先生诞辰11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353-362页, 成都: 巴蜀书社.
- [29] 马长寿. 1984.《氐与羌》,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 [30] 麦耘、朱晓农. 2012.《南京方言不是明代官话的基础》,《语言科学》第4期.
- [31] 缪钺、杨耀坤. 1980.《对“白马藏人”族属问题的探讨》, 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第26-33页, 成都: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 [32] 齐卡佳. 2008.《白马藏族为氐族说质疑》,《中国语言学集刊》(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第3卷第1期.
- [33] 瞿靄堂. 2016.《藏文的语言文字学基础》, 载瞿靄堂、劲松《汉藏语言研究新论》第39-66页, 北京: 中国藏学出版社.
- [34] 任乃强. 1987.《〈华阳国志〉校补图注》,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 [35] 阮元. 1965a.《〈春秋左传〉注疏》(影印清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 台北: 艺文印书馆.
- [36] 阮元. 1965b.《〈尚书〉注疏》(影印清嘉庆二十年(1815)南昌府学刊《十三经注疏》本), 台北: 艺文印书馆.
- [37] 尚理、周锡银、冉光荣. 1980.《论“白马藏人”的族属问题》, 载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白马藏人族属问题讨论集》第4-14页, 成都: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
- [38] 沈约. 1980.《宋书》, 台北: 鼎文书局.
- [39] 司马光. 1956.《资治通鉴》, 北京: 中华书局.
- [40] 司马迁. 1981.《史记》, 台北: 鼎文书局.
- [41] 四川省甘洛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1996.《甘洛县志》, 成都: 四川人民出版社.
- [42] 孙宏开. 2004.《我对藏语支语言特点的初步认识》, 载南开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化学院合办《南开语言学刊》(总第4期) 第17-25页,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 [43] 孙宏开、齐卡佳、刘光坤. 2007.《白马语研究》, 北京: 民族出版社.
- [44] 王双成. 2012.《藏语安多方言语音研究》, 上海: 中西书局.
- [45] 吴安其. 2016.《东亚太平洋语言的基本词及与印欧语的对应》,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46] 西田龙雄. 2002.《藏语的变迁和文字》, 周炜、王雁译, 载王尧、王启龙主编《国外藏学研究译文集》(第16辑) 第211-265页, 拉萨: 西藏人民出版社.

- [47] 夏察·扎西坚参. 1989. 《苯教发展概况》，索南才让译，《西藏研究》第1期.
- [48] 向柏霖. 2008. 《嘉绒语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 [49] 谢继胜. 1991. 《战神杂考：据格萨尔史诗和战神祀文对战神、威尔玛、十三战神和风马的研究》，《中国藏学》第4期.
- [50] 许慎. 1963. 《说文解字》(缩印清同治十二年(1873)陈昌治刻本)，北京：中华书局.
- [51] 杨光甸. 2008. 《凉山州冕宁县泸宁区藏族调查笔记》，载李绍明、刘俊波编《尔苏藏族研究》第65-252页，北京：民族出版社.
- [52] 杨铭. 2014. 《氐族史》，北京：商务印书馆.
- [53] 杨守敬、熊会贞. 1989. 《〈水经注〉疏》，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
- [54] 袁珂. 1980. 《〈山海经〉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 [55] 乐史. 2000. 《宋本〈太平寰宇记〉》(缩印宋刊本)，北京：中华书局.
- [56] 张济川. 1994. 《对藏语几个后缀的分析》，《中国藏学》第1期.
- [57] 张济川. 2009. 《藏语词族研究——古代藏族如何丰富发展他们的词汇》，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 [58] 张怡荪. 1993. 《藏汉大辞典》，北京：民族出版社.
- [59] 张永言. 1988. 《语源探索三例》，载《中国语言学报》编委会编《中国语言学报》(第3期)第135-149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60] 郑张尚芳. 2009. 《夏语探索》，《语言研究》第4期.
- [61] 郑张尚芳. 2017. 《复声母单化、元音推移、附尾转换在汉语演变及兄弟语分异上的作用》，载《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编委会编《中国民族语言学报》(第1辑)第21-5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
- [62] 周凤兰. 2005. 《略述藏族服饰的独特材料——氆氇》，载杨源、何星亮主编《民族服饰与文化遗产研究——中国民族学学会2004年年会论文集》第273-277页，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
- [63] Das, Sarat Chandra. 1902. *A 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 With Sanskrit Synonyms*. Calcutta: The Bengal Secretariat Book Depôt.
- [64] DeLancey, Scott. 2003. Classical Tibetan. In Randy J. LaPolla & Graham Thurgood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pp. 255-269.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65] Hill, Nathan W. 2005. Once more on the letter *q*.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28(2): 107-137.
- [66] Hill, Nathan W. 2009. Tibetan <ḥ> as a plain initial and its place in Old Tibetan phonology.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2(1): 115-140.
- [67] Hill, Nathan W. 2013. Relative ordering of Tibetan sound changes affecting laterals.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4(1): 193-209.
- [68] Hill, Nathan W. 2019. *The Historical Phonology of Tibetan, Burmese, and Chines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69] Jacques, Guillaume. 2004. The Laterals in Tibetan. Paper presented at the 10th Himalayan languages symposium, Thimphu, Bhutan, 1-3 December.
- [70] Jacques, Guillaume. 2012. A new transcription system for Old and Classical Tibet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35(2): 89-96.
- [71] Jacques, Guillaume. 2014. On Coblin's Law. In Richard VanNess Simmons & Newell Ann Van Auken (eds.). *Studies in Chinese and Sino-Tibetan Linguistics: Dialect, Phonology, Transcription and Text*, pp. 155-165.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72] Matisoff, James A. 2003. *Handbook of Proto-Tibeto-Burman: System and Philosophy of Sino-Tibetan Reconstruction*. Berkeley, Los Angeles &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73] Mazaudon, Martine. 1978. Consonantal mutation and tonal split in the Tamang sub-Family of Tibeto-Burman. *Kailash: A Journal of Himalayan Studies* 6(3): 157-179.
- [74] Mazaudon, Martine. 1994. Problèmes de comparatisme et de reconstruction dans quelques langues de la famille tibéto-birmane. Thèse d'Etat, Université de la Sorbonne Nouvelle. <http://stedt.berkeley.edu/search/> [2020-06-20]
- [75] Mazaudon, Martine. 2003. Tamang. In Randy J. LaPolla & Graham Thurgood (eds.).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pp. 291-31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76] Michailovsky, Boyd & Martine Mazaudon. 1994. Preliminary notes on the languages of the Bumthang group. In Per Kværne (ed.). *Tibetan Studies: Proceedings of the 6th Seminar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ibetan Studies, Fagernes 1992*, Vol. II, pp. 545-557. Oslo: The Institute for Comparative Research in Human Culture.
- [77] Stein, R. A. 1972. *Tibetan Civilization*. J. E. Stapleton Driver (tran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78] Takeuchi, Tsuguhiro. 2013.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Old Tibetan. In Takeuchi Tsuguhiro & Noihiko Hayashi (eds.).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he Tibetan Languages* (Journal of Research Institute 49), pp. 3-17. Kobe: Kobe City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A Study on the Di Language

JIANG Zhaozhong and Seda KARATAŞ

[Abstract] The Di language was spoken by the influential Di people thriving in western China from the Zhou dynasty to the Sui-Tang period. It has drawn the academia's attention and has seen several publications so far. Though most of the scholars agree that it is an ancient Tibeto-Burman language, no decision has yet been made as to whether it belongs to Lolo-Burmese or Bodish. This paper presents a collection of transcribed Di words with explicit meanings recorded in Chines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a textual research on these words, and comes up with their counterparts identified in written Tibetan. The correspondence in both sound and meaning between the Di words and their Tibetan counterparts leads us to the conclusion that the Di language is an ancient Tibetan dialect, quite close to written Tibetan.

[Keywords] the Di language the Di people the Tibetan language

(通信地址：姜照中 300044 新竹 新竹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
Seda Karataş 300044 新竹 新竹清华大学科技管理学院)

【本文责编 胡鸿雁】